

走向定居的以色列贝都因人

冯基华

贝都因人(Bedouin)系游牧的阿拉伯人,以部落为基本社会结构,在中古初期为阿拉伯半岛的主要居民,处于水源、牧场公有的原始公社制阶段。他们大多逐水草而居,以养驼、养羊、狩猎、掠夺为生。目前,在以色列约有10多万贝都因人,他们在一个高度文明、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中生存,必须面对并接受现代文明的挑战。

一、以色列社会中的贝都因人

1. 以色列对贝都因人的定居政策

早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贝都因人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过程就已经开始。由于加利利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改变,促使贝都因人向定居生活转变。以色列建国后加快了这一进程,然而定居过程形成了非常庞大的自发定居区。60年代以后,以色列政府开始实施对贝都因人的定居政策,贝都因人从自发的定居逐步转向了有计划的、永久的定居。

自发的定居是一个缓慢的、逐步的过程,从临时的帐篷发展到铁皮屋、木屋和石头房子。自发定居是典型的游牧方式,没有计划性,也没有任何公共设施的服务。他们散布在广大的地区,包括一些以色列没有打算用来永久居住的地区。从帐篷到铁皮屋形成了一些庞大的自然村落,并且散布在许多地方,最具代表性的是文苏维德部落。1960年后期,这个部落居住着400个氏族,散布在25000杜纳亩(1杜纳亩等于1000平方米,或约1/4英亩)土地上。1973年,为了更好地控制自发定居,政府修建了数百座石头房子和3000座铁皮屋。

以色列政府在1960年制订了贝都因人的定

居政策。为了控制大批的非计划性的、难以管理的小部落的非法定居,政府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大型居住区供贝都因人迁居。政府将提供所有的基础设施诸如水、电、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和道路,提供的设施同给犹太定居点所提供的设施一样。1962年以色列计划在内盖夫建立3个定居区,并在1963年批准增加了一个。到目前为止,7个定居区已经在内盖夫建立,包括拉哈特目前已经有30000人。

由于以色列制定的方案缺乏对贝都因人社会和文化的考虑,在对贝都因人定居政策实施几十年后,仍然有数百个帐篷散布在内盖夫方圆150万杜纳亩土地上,对此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也没能找到解决这一长期遗留问题的办法。又由于贝都因人人口的快速增长,一般为年增长率5%,即每14-15年翻一番,加剧了局势的恶化。今天,贝都因人在内盖夫的人口达到95000人,约50000人居住在认可的定居区内;到2005年,人口将增长到120000人。因此,在引导定居的同时,控制贝都因人的非法定居是以色列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2. 影响贝都因人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因素

贝都因人从游牧转向定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有4种因素影响这一进程:政治、经济、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因素。

政治因素:在奥斯曼统治时期,国家法律不适用于贝都因人。他们不必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役,被允许携带火枪,并拥有自己的法庭。很长一段时期贝都因人实际上在加利利控制着大片土地,从小部落和村庄中收取税收,总的说来为

这个地区的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英国对生活在边界附近的贝都因人的活动十分关注,为防止争斗和边界冲突,委任统治当局对贝都因人加强管理。有史以来第一次,贝都因人不得不携带护照,不能再携带火枪从事抢劫、袭击活动。同时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对贝都因人的安排是比较友善的,给他们政治自治权,在发生灾难时救济他们,有争议时介入调停。1942年,英国通过了法律,加紧对贝都因人部落的控制,向他们介绍定居方式。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统治下,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收入的提高,使贝都因人开始建筑铁皮屋并定居下来。

经济因素:自从1858年奥斯曼帝国立法将土地和土地所有权分成等级以来,贝都因人的定居模式开始改变。由于当时这一地区的安全状况大大加强,村民们开始割远离他们的土地上耕作。在加利利由于人口的增加,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开始改变在土地上放牧代之以耕作土地。奥斯曼帝国开始没收没有交税的部落土地以及3年无人耕作的土地。这些因素导致了游牧范围的越来越小,随之游牧群体也越来越小。在19世纪后期,立法没收了贝都因人的土地,并严禁贝都因人从事抢劫,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出路,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不久贝都因人就发现工作所得的报酬,不比抢劫来的少,于是逐步放弃了他们的传统,转向永久性定居。因为不再带着家畜迁徙,以及铁皮屋也比传统的帐篷便宜得多,促使他们建造铁皮屋来替代传统的帐篷。贝都因人由此逐步开始了他们的定居过程。

地理因素:在加利利,贝都因人迁徙到人烟稀少的地区,即沼泽地和原始森林以及山区等不适合农耕的地区。以色列北部地中海型气候使大片的土地适合农业生产,减少了游牧的范围,这促使他们定居下来。那里都是阿拉伯村庄,贝都因人与当地居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开始了模仿和学习过程。

社会因素:在加利利一半以上的贝都因人部落是从豪兰山(在叙利亚境内)和戈兰高地来的,其它的贝都因人来自埃及、库尔德和土耳其。在加利利一些家庭结合后又产生了新的部落。很

多加利利的部落是某些民族和个人的后代,这些民族和个人因为血缘冲突、追捕、争执或为了寻找新的放牧草地而离开了原居住地。在193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中,加利利有100多个部落,包括许多小部落,最大的部落有1000人。在以色列南部部落的数量少一些,但部落关系庞杂。1931年以色列南部最大的部落有16000人。加利利的部落较小,并且是按地区分开的,因此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较弱,这些都有利于定居。向永久定居的方向转变使得贝都因人和当地人的通婚成为可能,同时他们模仿当地人并学习他们的文化习俗,贝都因人逐渐与农耕人口融合。

3. 贝都因人对定居政策的态度

针对以色列当局提出的定居政策,贝都因人提出一些异议:一些人认为迁徙到指定定居区会影响他们对现在已经居住土地的所有权的拥有。他们还认为集中到指定定居区永久地居住,意味着他们被控制,并且需要交税。他们强调指定定居区缺少放牧草地(没有地方来饲养他们的家畜)。贝都因人反对永久定居的另外原因在于他们不得不缴纳诸如水、电和电话等费用。贝都因人也反对指定定居区的土地价格与他们拥有的土地价格的差异(他们用来换取在指定定居区的土地),这些价格是由政府的评估员评估的。一些部落领袖还担心他们的影响力在指定定居区居住后会逐步减弱。但是,总的来说贝都因人并不反对接受政府为他们改善生活质量而提供的一些服务。

二、贝都因人的生存与发展

1. 贝都因人的现状

在永久定居区,大多数贝都因人的工作是建筑工或非技术劳动。与加利利当地村民相比,贝都因人定居区拥有较少的农耕土地。这是由于在职业传统上的不同,并且很多家庭饲养家畜,是一种传统习惯的延续。另一方面,更多的贝都因人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

今天,在以色列的贝都因人中,年轻的男人不再依靠父辈的遗产,家畜和耕地均已减少,农业不再是唯一收入来源。很多人靠出外打工维持生活。年轻的男人在以色列农业区中劳动,在

住地周围的农场中工作。他们有自己的银行账号和信用卡,不仅不再依靠家庭,反而贴补家用。在外打工的人在经济上不再依靠他们的家族,一些人已经购买了重型机械,成为承包主来雇用其它的工人。这表现了个人与家族之间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个人变得越来越自立,家族、氏族势力逐渐被削弱。部落领袖害怕部落社会结构的改变,在从游牧和半游牧向永久定居的转换过程中他们试图保留民族的文化习俗、传统的司法体系和行为准则与价值观。

2. 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尽管对贝都因人的管制法废除了,部落法律仍然在贝都因人部落中实行着,甚至在一些非正式的“民事法庭”上仍在实行。他们无法将自己从一些过时的游牧民族习惯中解脱出来,比如在婚礼上的聚集仪式、血缘关系的争执、安慰和祝贺仪式等诸多习俗。迄今为止,仍有一些人认为对部落的忠诚是第一位的,其它的忠诚是第二位的。即使在定居以后,这种传统、纯朴的忠诚方式仍在沿袭。

贝都因人的成婚方式有几种,与第一父系平等的堂兄妹,即父亲兄弟的子女为婚姻首选。第二种是族外婚姻,包括部落内不同后代间的结

合,以及与其它社区的居民结婚。族外婚姻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经济或政治利益。换婚即两家兄妹相互结婚,如果一对破裂了,另一对也自动破裂。换婚既可在族内,也可在族外。所有族内和族外的婚姻都是指定的,通常是基于男方家族的考虑,而不是通过自由恋爱。族长们决定他们族内一个男人的结婚方式:与堂兄妹、或是在族内、或是族外、还是换婚,一对新人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利。

值得提起的是近些年婚姻开始向着自由恋爱的方向发展,冲击着传统的婚姻观。过去的姑娘不是做牧羊女就是在家里帮助母亲,现在开始上初级学校,近年来甚至上高中。男孩和女孩在教室里社交,这种交往影响到社会关系。自由恋爱使孩子们的独立性增强,父亲们的权力下降,逐渐削弱了贝都因人传统的社会道德观。为了消除现代化社会的压力,父辈们正在极力维护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控制体系。

内盖夫的贝都因人社会被犹太人定居点所包围,犹太人在内盖夫的发展也限制了贝都因人的放牧。在定居的过程中,老一代试图保存传统文化与风谷习惯,他们极力维护民族、部族的凝聚力。然而,年轻的一代正走向更广阔的社会。

